

论女性教育的社会回报

庄 平

本文论述了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从生产率提高方式、就业层次和家庭收入等角度说明了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可能带来的经济回报,又从人口生育、人类健康及后代成长等角度说明了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可能带来的社会回报。由此,该文认为女性教育是改善人的生存条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比男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多的女性教育,能获得更高经济社会回报,是加快社会进步最合算的选择。

作者:庄平,女,1955年生,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近几年,随着国际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均衡等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不同性别教育投入的回报率差异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女性作为具有独特生理功能和社会角色的性别群体,社会为她们提供的受教育机会的多少,她们受教育水平的高低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就我国女性教育的现状及妇女教育的社会回报问题作一概要分析。

一、我国妇女受教育水平的现状

人们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是由受教育年限和文化程度来衡量的,不同群体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构成了群体规模的不等的教育存量。建国40多年来,我国妇女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仅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8年间,我国女性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同龄女性人口的比例,由1982年的49%下降到1990年的31.93%。而女性人口中高学历人口比重有了较大幅度提高,1990年,我国6岁及以上有文化的女性人口中,中等教育水平(含初中、高中、中专)人口占40.4%,比1982年增加了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1.4%,比1982年增长了0.7个百分点。^①由于高学历女性人口增多,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延长,使全国女性人均受教育水平有了提高,达到5.58年,比1982年提高了将近一年,大体上相当于小学5—6年级水平。

教育是把人类创造的文化“内化”为个体知识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作为一种内聚和释放人的智慧的产业,具有明显的间接增殖性和迟效性的特点。教育的间接增殖性是指它可以通过提高人的学习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同时还能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以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因此,教育产品的价值高于任何一种物质产品的价值,在时空上有高度的延伸性,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可在未来得到加倍偿还。所谓教育迟效

^①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性是指教育又是一种周期性最长的产业,一般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比使用时间约提前10—15年,其投入产出效益几乎要在十几年后才见分晓。教育的这个特征又使得社会上目前存在的狭隘功利主义行为有了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不情愿把有限的发展资金更多地投向教育,更不情愿投向女性教育。尽管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受经济、政治和传统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人口受教育水平与男性人口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城乡妇女之间、不同职业妇女之间在受教育机会上还存在着较大的不均衡性,其总体状况不容乐观。

(一)在受教育机会上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0年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男性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18年,人均受教育水平达到初中二年级阶段,比女性人均受教育年限的5.58年多了1.6年。与男性人口相比,女性人口受教育层次越高,与男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性越大。在我国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男性受小学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1.1倍,男性受初中教育机会是女性的1.54倍,男性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1.56倍,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机会是女性人口的2.3倍。^①

但就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性别分布而言,全国1.8亿文盲半文盲人口中,有1.28亿为女性,占70%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91年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全国20—54岁城乡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口,女性占了80%。^②1990年全国6—14岁不在校人口有3373万人,占同龄儿童的19.07%,除了按当年95.9%的小学入学率计算,这些不在校人口中,有138万人从未入学外,其余则是8年来积累下的辍学儿童,平均每年约计有400万儿童辍学,这几百万每年辍学失学儿童中,女童又占了70%以上,^③全国不能入学的儿童中,又有80%是女童。^④这说明,我国在受教育机会上,存在着事实上的巨大性别差异,女性成为我国文盲大军的主体。

(二)女性受教育机会上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距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长期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制度,导致城乡间巨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在女性受教育水平方面,城乡女性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1990年,我国6岁及6岁以上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46年,镇是7.36年,县为4.774年,^⑤市、镇女性受教育机会分别是县女性受教育机会的1.57倍和1.55倍,而同期市、镇男性受教育机会分别是县男性受教育机会的1.35倍和1.34倍,说明女性受教育机会上的城乡差距大于男性。

从全国文盲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文盲人口的84.7%在农村,其中71%是女性文盲,也就是说,全国的1.28亿女性文盲中,农村妇女就有1.1亿以上,占全国女性文盲总数的86%,超过我国农村女性占全国女性人口的比例(81.79%),全国农村文盲人口中有75%是女性文盲。^⑥

(三)女性在受教育水平上存在着行业差距

1985年以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1992年下降到25%左右。然而,占全国78.9%的人口在农村的格局无根本改变。尽管我国农村的非农产业产值不断增加,但非农产业劳动者占农村劳动者的比重没有太大增加,1994年这一比重仅为12.2%,全国

① 根据《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②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万国出版社1994年版。

③ 《中国人口年鉴1992年》第43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④ 《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第3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⑤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⑥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 55%。全国女性就业者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 76.12%，而且这部分人口规模还在扩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 1991 年的调查，农村 20—54 岁女性有 91.03% 是做家务和务农，从事副业(2.21%)、乡镇企业(3.94%)和个体商贩(0.76%)工作的女性比例很小，其人数只相当于农村男性从事这类职业人数的 42%。^①

由于不同职业的技术含量不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国不同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吸纳需求也不一致。女性就业人口受教育水平结构方面，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女性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 30.2%，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4.99 年，远低于全国女性在业者平均 6.06 年的水平，其他行业女性在业人口中文盲都不超过 6%。^② 可见，我国农村女性劳动者还不具备被其他行业吸纳所必需的受教育水平，女性群体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成为女性劳动者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受阻的重要原因。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受教育机会在人群中的配置、教育投入趋向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大多数人已有的价值观念。在我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人们有着对男孩的性别偏爱，从而造成对两性受教育态度的差异。很多人把有限的教育资金仅向男孩倾斜，这种性别偏好是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不如男性，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重要因素。

人类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自认为“很完善认识”的某些领域，经常还存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或“盲点”。在教育问题上，“男比女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上学是为别人投资”的社会认知，视两性受教育水平差异为“正常”的社会心态，都是人类的认识误区。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正确审视妇女教育的社会回报(收益)，还女性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

二、女性教育的经济回报

人所以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过程，其驱动力是满足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以保障自身的一定消费水平，“个人才能”在这一过程中的释放，是通过掌握劳动工具并作用于劳动对象实现的，所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知识、技能、体力的结合。教育可以通过增进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深化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了解，优化人们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所作出的各种选择。经济活动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要求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量，它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不同时期对经济活动中技术规范的深谙程度，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具体地说：

(一)受教育水平与创造物质财富总量的关系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教育投资的效益一般比有形资产的收益更高，在发展中国家最初等教育的经济收益率是有形资本的两倍。^③ 每增加一年的学校教育时间，在韩国可以使农业产量提高 2%，在马来西亚则可使农业产出提高 5%。在秘鲁，如果农民多受一年学校教育，就可以使他们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提高 45%。^④ 国内也有类似的研究报告，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创造的产值就大相径庭。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农业劳动者人均年创产值仅有 1—2 千元，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传统产业工人人均年创产值 1—2 万元，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人员年创产值可达 10.2 万元。^⑤ 由于智力物化在形成现代经济产品

①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第 231 页。

② 《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

③ 世界银行《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64 页，财经出版社。

④ 世界银行《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57 页，财经出版社。

⑤ 人民日报 1991 年 12 月 8 日，第 8 版。

或劳务中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高素质的劳力能把知识和技能有效地运用到生产过程中,有利于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和使用,也能有效地实现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从而实现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巨大节约,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

我国长期存在的女性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而且不同性别人口随受教育水平提高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决定了女性在国家经济增长中作出的直接贡献比男性低,其潜力远没有发挥出来。从我国女性教育已有水平看,仅就在妇女中普及小学教育,便可使我国未来15年少生1800万人这一项,每年节省下的生活资料价值就达数百亿元。^①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受教育水平如果无法提高到接近男性的受教育程度,由于提高男性教育水平而取得的社会效益就会被抵消掉。据加拿大一研究机构1987年的统计,由于文盲造成的工伤事故、生产能力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重新培训所需开支的费用等,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0亿加元(约合33.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100亿加元(约合83.7亿美元)。^②可见,高文化素质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及其创造力,是形成新生产力的动力。

(二)女性教育与就业层次的关系

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渐渐被冲破,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各种生产要素开始按市场规律动起来,城乡人口也按工业化城市化的规律流动,由乡村流向大中城市,由第一产业流向二、三产业……,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有1.6—1.7亿农村劳力永久或暂时地转移出农业,流向其他非农产业,仅1990年我国务工经商农民迁移人数就比1987年增长1.9倍。^③

劳动力流动的许多研究证实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流动人口比全体人口有更高的文化水平,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是:大学占8.20%,高中占20.41%,初中占33.04%,小学占22.20%,文盲占11.15%,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流动人口的61.65%,而全体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是大学占1.01%,高中占8.01%,初中占24.65%,小学占42.09%,文盲占24.23%,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33.67%,受教育程度构成远低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④而且人口受教育水平越低,流动性越小。

近些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中有一个趋势,即女性少于男性,这与我国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现状不无关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和全国百村劳动力的调查,1986年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的男女比例是4:1,199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4.5:1;1994年上海、北京的外来民工的男女比例为2:1。^⑤其实,人口流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上的人才和知识在地区上的再分配过程,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力经济流动性倾向较弱,迁移行为概率很低,由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的障碍大,由本地向外地迁移可供选择的就业空间小,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需要,即使转移出去,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回流”率也很高。

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劳动力流动情况还说明,一是越欠发达的农业集中地区,外出打工的劳力越多。农业劳力外出打工的数量占整个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东部是7.2%,中部占14.3%,西部占13.4%;二是越欠发达的农业集中地区,外出打工的劳力中女性所占的比例

① 杨耀臣:《论普及教育在人口控制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6期。

② 《人口学刊》,1992年第3期,第2页。

③ 《1995年社会蓝皮书》,第154页。

④ 蔡占明等:《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近期形势》,《人口与经济》1991年第5期,第42页。

⑤ 《1995年社会蓝皮书》,第340页。

越低。外出打工的农业劳力的男女比例,东部为 35:1,中部为 4:1,西部为 6:1。^① 从事农业的女性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低,难以进行就业转移,从而造成越是贫困的农业区,集中着越多的务农妇女,在许多农业劳力外流的地方,出现了“农业女性化”趋势,这种沉淀于农业的女性劳力,平均文化水准较低,一般只能停留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上,无法对农业资源进行合理的综合开发利用,对接受和利用农业科技知识则“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女性就业构成层次来说,1992 年我国女性劳动就业者占女性劳动年龄总人口的 72.3%,占全部社会劳动者的 44%,^② 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世界就业女性占世界全部就业者总数 34.5% 的比例,说明我国妇女就业的广泛性。但是,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现状对女性就业构成产生重要影响,女性就业主要分布在一些对文化技术需求较低的农、林、牧、渔、水利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 76.09%)、工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 12.76%)、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占女性在业人口的 4.14%),但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女性只占该行业职工的 36.98%,在金融保险业女性只占 39.51%,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女性更少,只占 22.65%。我国女性就业结构层次低与女性受教育水平低有关,因为这些职业对供职者的文化素质要求较高,如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12.03 年,在金融保险业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11.59 年,在国家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就业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11.09 年,而在农林牧渔水利业的就业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只有 4.99 年。^③ 显然,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现状不利于提高就业层次,不利于产业女劳力的转移,也难以提高女性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再看看城镇在业者的情况。1994 年,城镇国营和集体企业富余人员至少 3000 万,这些企业中往往女性就业比例所占相当大,近几年企业人员裁减中,下岗和失业女性的绝对数不断增大,约占到下岗人员的 60% 以上,这些下岗女性中有 70—80% 文化程度较低,^④ 多是无法通过在职培训掌握新技术的 31—45 岁的已婚女性,自身素质低加上社会偏见,使这些女性再就业更为困难。一大部分下岗和失业时间过长的女职工家庭成为城镇的贫困户。

(三)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方面

人的受教育水平不同不仅会造成工作效率的差异,也会带来个人收入水平的差距,一般人的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水平呈正比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就业者,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时间一般可使工资增加 10% 左右,例如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韩国可使就业者工资增长 6%,印度尼西亚可增产 10%,秘鲁可增长 12.5%,泰国可增长 15%。但在世界各国,妇女地位都是比较低的,即使是受同等教育程度的男女,也很少有同工同酬的。据联合国《1985 年世界妇女状况》文件的描述:占人类半数的妇女完成了按小时计算的全世界工作量的 2/3,工资收入只相当于男性的 1/10。在发展中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更低,其收入更少。但有关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个人工资收入增长的影响大于男性,成年妇女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泰国可增加其工资收入 25%,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约增长 18%,印尼和秘鲁约增长 12%,^⑤ 女性因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造成工资收入提高的比例高于男性。

我国也曾有类似的报告,湖北省农村抽样调查队 80 年代末对该省调查发现,以家庭成员

① 《1995 年社会蓝皮书》,第 340 页。

②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 《中国人口经济年鉴 1992》。

④ 《1995 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第 337 页。

⑤ 世界银行:《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57 页。

最高文化水平为准,人均收入呈现明显的梯度差异:大专 530.5 元,高中 428.30 元,初中 395.60 元,小学 335.20 元,文盲 287.25 元。^① 在城市,个人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联系还不明显。女性教育的回报率仅为 2.9%,低于美国 7% 的水平。^② 但是对文化技术水平要求高的就业岗位,一般也是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岗位。正常情况下企业减员时,那些文化水平低,不能学习掌握技术的人员会被列在优先裁减之列,作为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的我国女性群体,在强烈的性别偏好的文化氛围中,在谋取和保持高层次职业和获取高收入方面没有大面积的优势。

受高水平教育和有高收入职业的已婚女性,由于生养孩子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高而倾向于少生育孩子,同时增大对有限子女教育投资的绝对量,使代际受教育水平恒定在较高的值上,这不仅有利于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有利于后代的成长,还有利于社会人口规模的控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形成高文化教育水平—高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人力投入—高人口素质这类家庭延续的良性循环。

三、妇女教育的社会回报

当今世界各国不仅用经济发展指标,而且运用诸多标识社会发展和人口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全面发展状况,如婴儿死亡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妇女总和生育率、成人识字率等都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而这些指标都与女性受教育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一)女性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

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自 1987 年回升到 2.59 之后就持续下降,1990 年达到 2.15,1993 年达到 1.82,但这个结果从政府到学术界都认为是不稳定的,从世界人口发展规律角度看,我国生育率转变速度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低生育率的出现主要是政策因素的作用,是行政手段强制的结果。有关调查表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大多数夫妇仍希望要一个以上子女,在目前条件下,只要政策约束一放松,全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反弹是必然的,这一分析除了以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为依据之外,还基于我国大量女性文盲人口存在和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低的现实。

从生育率来看,1982 年我国 49 岁以下育龄女性生育率调查数据表明,小学文化程度的妇女比文盲平均少生 0.93 个孩子;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妇女比文盲平均少生 1.66 个孩子;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妇女比文盲平均少生 2.33 个孩子;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比文盲少生 2.8 个孩子。^③ 抛开人为控制人口的硬性行政措施不论,与女性自觉控制生育相关性最大的变量就是受教育水平。我国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终生生育次数减少 0.179 次,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5.57 年,她的终生生育次数减少一次,而且初中文化程度是使妇女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从注重生育数量转向注重生育质量的一个关节点。^④ 所以受教育水平对女性的生育行为有肯定的调节作用。

国外一些调查研究显示,妻子的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明显大于丈夫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例如印度 1960 年到 1961 年城市妇女的调查说明:当丈夫的受教育水平分别是文盲和大学时,其家庭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为 7.04 和 5.54,两者相差 1.5 个,生育下降

① 潘纪:《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素质》,百家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1 页。

② 史柏年:《失学女童救助与家庭现代化》,《人口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45 页。

③ 《人民日报》1987 年 12 月 14 日。

④ 刘铮:《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人口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5 页。

幅度为 21.3% ;当妻子的受教育水平分别为文盲和大学时,其家庭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为 6.65 和 2.01 个,两者相差 4.46 个,下降幅度为 69.8%,^①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是我国人口控制由被迫转为自觉的一个有效途径。

女性受教育水平还与她们初婚育的年龄关系密切。我国已婚女性绝大多数是在结婚 1—2 年内生育,因而早婚必然伴随着早育,而且女性终生生育期加长。一般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她在校学习的时间越长,客观上必然推迟结婚年龄,缩短生育期。据对世界 14 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有 10 个国家具有受 7 年以上教育的女性比未受过教育女性的结婚年龄至少要晚 3.5 年。^② 人口繁衍的一个简单道理是,人口 20 岁结婚生育,100 年就有 5 代人,25 岁结婚生育,100 年就有 4 代人,女性的初婚年龄与人口规模密切相关。据第四次人口普查 10% 抽样汇总资料分析,我国农村 15—20 岁早育女性占当年有生育女性的 14%,仅这部分女性,全国一年就多出生 270 万人,^③ 这些新增人口更加重了国家本来就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有关研究还表明,倘使已婚女性能受较好的教育,她就能较快掌握新的简便、安全、有效的避孕技术,从而有助于降低生育率。相反,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已婚女性,就不容易掌握避孕所需的生理学和医药学的一般知识,从而很难做到终生成功地避孕。

(二)女性受教育水平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1993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认为,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减少伤病残能取得的最大成效的措施是扩大公共医疗保健服务、增强女孩基础教育投资和发展经济三项,在低收入国家,前两项措施尤为急需。在本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生理和医药等科学知识还没有发展到能控制或减少人类疾病的程度,许多疾病还在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那时的世界各国即使工业化国家儿童死亡率都很高,并且也不因母亲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有多少变化。

当本世纪医药卫生科学知识和技术飞速发展,以至于能有效控制和减少疾病对人体的威胁,延长人的寿命的情况下,人的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女性的教育程度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就极为明显了,一般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操持家务,保持家庭卫生,处理食物,准备和制作饭菜,喂养照顾幼儿或病人,她们一定的文化水准可以优化日常生活行为的选择,提高家庭各种资源的(如现金收入、各种生活物资等)使用效率,有利于家庭成员及后代的健康成长。据对北京市两城区一县 80 年代末的调查,按母亲文化程度分组的 0—4 岁婴儿死亡率调查,母亲是大学文化程度者,死亡率为 1.67%,母亲是中学文化程度者,死亡率为 3.058%,母亲是小学文化程度者,死亡率为 5.68%,母亲是文盲者,死亡率为 8.6%。^④

儿童的健康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而不是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世界银行对 25 个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健康调查表明,若其他条件相同,母亲甚至只受过 1—3 年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的风险降低将近 15%,而父亲同样文化程度却只能使婴儿死亡率减少 6%,在秘鲁,母亲受过 7 年及以上教育的儿童死亡率下降 75%,比受过同样教育的父亲使儿童死亡率下降的数字高 47 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受过一定教育的母亲比文盲母亲更会利用有限的可食物质,较合理地调剂孩子的食品,设法减轻因贫困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在科特迪瓦贫困农村家庭中,在文盲母亲们的子女中有 24% 发育不良,而略受过初等教育的母亲的子女只有 11% 营养不良。^⑤ 婴

① 联合国:《世界人口控制趋势和政策年报告》1977。

② 魏津生:《现代人口学》,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3 页。

③ 《1992 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 439 页。

④ 刘铮:《人口现代化与优先发展教育》。

⑤ 世界银行:《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43 页。

幼儿营养不良死亡率高对社会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的损失,社会为死亡婴儿投入的前期培养费被消费掉而得不到任何回报,死亡婴幼儿母亲在怀孕、分娩、哺育期间的身体损伤和放弃的机会收益也得不到补偿,减少对社会的贡献。

女性受教育水平对成年人的健康也有明显的影响。当今社会人口健康和延缓生命的秘诀之一是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和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受过越多教育的已婚女性,就越有可能选择和在家中推行对家庭成员健康有利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家庭成员有健康的体魄,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生病误工的天数,延长潜在的工作年限,相对增加家庭收入。而发展中国家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已婚女性,生育率高,抚育子女多,家庭收入的大多数用于食品消费支出,非生存消费支出所剩不多,用恩格尔系数进行评价,完全属于生存消费,从而有可能弱化家庭成员的体质和子女的智商。秘鲁有一项对25—29岁青年的调查,被调查者中受过教育的父母在调查时仍活着的为72%,而未受过教育的父母仍活着的为55%。^①

(三)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子女成长的关系

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女性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期望值也不同,从而对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产生一定影响。有一定文化水准的母亲不仅有可能使子女在整个生长过程中享受趋利避害的好处,而且还有能力自觉摸索和按照儿童心理规律启发教育子女,注重子女智力和心理的发展,期望子女受良好教育,未来事业有成,因而她们更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上多投入。据1987年北京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文盲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占全部子女投资的10.54%;初中文化的父母教育投资占对子女全部投资的17.16%,而大学文化的父母教育投资占子女全部投资的26.27%,^②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子女受更多学校教育的可能性越大。

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女性,一般都分布在贫困或低收入人口群中,她们的生活标准低,养育子女的费用也低,“身在苦中不知苦”,不能明显地体会到多生养子女的艰辛,“多一个孩子多一双筷子”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她们对子女主要寄希望于尽早为家庭带来经济收益和自己年老时的归宿。因此,她们的子女年龄很小就作家务,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或外出打工,过早地分担了家庭经济的担子,没有足够的受教育机会,长大以后,这部分人又加入到文盲大军中,重复着他们父母的同样命运。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晰一个道理,女性教育是改善人的生存条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无论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上都与男性有不少差距,女性群体内部受教育机会也是非均衡的,这都会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文盲半文盲女性人口的大量存在,必然会造成大量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浪费,造成生产和生活的低效率,为之所付出的代价足以抵消甚至几倍于性别偏爱为男性多投入的全部教育费用。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投资于女性教育是一项最合算的选择(包括经济和社会收益两方面),将新增教育投入用于比男性受教育水平低得多的女性教育,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回报,这是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工作。

责任编辑:谭 深

^①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3页。

^② 袁桂林:(试论教育对人口优化的影响),《现代化中小学教育》1992年第2期,第68页。